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资料·

西方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反响

赵 雷

1992 年春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这一讲话的重要性也日益受到国外的重视。西方的主要报刊杂志都从它们的认识视角出发,对谈话的背景及影响进行了报道和分析。以下根据查阅的外文资料,对西方学术界和舆论界的有关反响作些介绍。

一、对南方谈话作出反响的基本情况

西方学术界和舆论界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关注程度是逐渐提高的。1991 年底到 1992 年初,受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西方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方面。起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并未引起他们的充分重视。除了一些小幅报道外,反响并不热烈。

西方媒体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视始于 1992 年 4 月下旬以后。4 月 27 日,美国《新闻周刊》以《邓的复活》为标题,并以邓小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部分照片作封面,对邓小平南方视察进行了专题报道。文章中说:当政治分析家开始以过去式谈论邓小平的时候,他们再一次低估了这个小个子。意思是说邓小平将再一次对现实中国产生重大影响。英国出版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刊物《中国季刊》在 1993 年第 3 期上,以邓小平研究为主题,刊登系列文章,从各个角度进行了专门研究。这些研究论文虽然都是站在宏观的角度,着眼于邓小平整个政治生涯的研究,但却都无一例外地把邓小平到南方视察看做其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事件加以强调。此外,像美国的《时代周刊》、英国的《泰晤士报》等有影响的报刊以及其他一些新闻媒体也大量报道了有关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消息。

由于国外侧重于对邓小平的宏观研究,所以我们难以从中找到 1993 年后近 10 年里专门分析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文章。但是,在研究邓小平政治生涯和他的中国改革思想的宏观性文章里面,关于南方视察的评述却时常出现。这些评述基本上是侧重

于对南方谈话的深远影响的分析,在这方面以 1997 年邓小平逝世后一段时期为最。如 1997 年,邓小平逝世后,《纽约时报》、《新闻周刊》、《泰晤士报》等报刊都对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作了总体评价,其中相当一部分对 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作了评述。2001 年 1 月澳大利亚出版的《中国研究》杂志对当前的中国政治进行了专题研究,其中几篇文章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到了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情况。因此可以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在西方引起了长时间的反响。

二、评论南方谈话的一些主要观点

从西方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反应来看,首先是将这一讲话与苏东剧变相挂钩。他们认为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国际背景就是苏联解体。国外分析家几乎一致认为,苏联解体对邓小平的影响是很大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中谈及的许多话题都是从苏东剧变事件中吸取教训为出发点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他的《政治家——邓小平》一文中明确指出:“邓在退休后复出重新点燃改革进程的决定,与苏联和东欧垮台的教训有很大关系”^①。迈克尔·亚胡达(Michael Yahuda)在他的文章中也强调指出,邓小平关于“苏联解体的部分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政权的经济失败”和“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否存在下去,取决于它是否能持续地提供不断增长的经济繁荣”的观点,是他南方谈话中思考和阐述问题的重要背景^②。《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和《泰晤士报》刊登的一些文章也指出,邓小平进一步推动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防止苏联、东欧的事件在中国重演。应该说,西方媒体的这一观察有一定的道理,邓小平的确非常关注苏联

① Shambaugh. David, "Deng Xiaoping: The Politician",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93, p.488.

② Yahuda. Michael, "Deng Xiaoping: The Statesman",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93, p.551.

的经验教训，南方谈话中也专门谈到了苏联的教训问题。

西方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第二个反应，比较集中在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上。一些报道普遍认为这一讲话吹起了推动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劲风。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华采取孤立和制裁的政策，中国则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在进一步巩固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关系的同时，不仅和西方一些国家改善了关系，还与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取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有的媒体报道将中国的外交活动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联系在一起。1992年2月，李鹏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各成员国首脑会议并与布什会面。2月10日的《时代周刊》以《邓激起浪花》为题，报道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消息，同时配发了一张名为“打破坚冰：李到达罗马”的李鹏出访欧洲四国的照片。文章认为，中国外交所获得的成果似乎使中国重新迈开了脚步。同一天的《新闻周刊》则认为，李鹏在纽约的短暂露面表明，中国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将以它自己的方式回归世界大家庭。邓小平的努力是要使中国一方面能够在国际形势的动荡下维护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积极开始实验自由市场的改革。该文还认为，邓小平趋向于坚持这条道路^①。路透社认为他的南方谈话是向西方传递一个信息：中国将继续坚持进一步加快改革^②，以此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决心。

应该说，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的深入发展，西方关于邓小平南方视察对中国改革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认识在不断地加深。尤其是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他们普遍认为1992年的南方视察作为邓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有人认为，南方视察的结果是经济爆炸式地增长^③。有的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使外资重新回到中国^④。有的还指出了南方视察对地方改革的推动作用，如有文章引用一个上海经济学家的话说，“1991年说的最多的是，搞不好了。”但是，邓小平南方视察后，一切都变了，认为南方视察后上海实现了经济繁荣^⑤。

西方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第三个反应，认为它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作准备。国外舆论认为，邓小平认识到选择什么样的领导人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他的南方视察正是为1992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人事安排和理论阐述施加影响。有评论认为十四大也许是邓小平要经历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所以，通过

南方视察确定基调，是为确定下一代领导人指明方向。他们指出，马上就要召开的人代会和十四大，对中国此后几年的改革非常重要，这也许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巩固自己的遗产的机会”^⑥。也有人认为“邓小平唯一的、最大的失败是没有确保平稳接班”^⑦。他亲自选拔的两个接班人都先后出了问题，这一年邓小平的政治战略就是选择年轻的改革者进入最高领导层以便跨越经济发展的障碍。一些评论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是，要为形成坚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高层领导班子和维护改革开放的成果打开通道。

西方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能否在中国实际地推行也十分关注。他们认为，邓小平南方视察前后，中国的改革面临很多问题。有评论指出，邓小平把很多改革的难题放在了最后，如国有企业改造问题、政府机构臃肿、腐败和财政赤字等^⑧。有的文章还引用了一些具体的材料分析了摆在邓小平面前的这些难题。比如，有的文章认为国有企业改造问题难就难在长期以来形成的“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问题，如果说以前的改革是通过增加工资来维持信心的话，那么，现在要砸烂这“三铁”，面临的就勒紧腰带。不解决这一问题，就会扩大赤字。但是，关闭一些严重亏损的企业，就会扩大中国的失业大军，导致新的政治危机。另外，他们还认为，中国的搞裙带关系、腐败等问题非常严重，犯罪率也在上升。对邓小平领导能力的考验，最终取决于他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国外舆论还强调了强力推行改革开放面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有文章说，由于保守派（或左派）控制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尽管邓小平在1990年前后曾组织

① Deming. Angus, Jr. Frank Gibney, Bingham. Clara, Mabry. Marcus, Pia Hinckle, "An Opening for China", *NEWSWEEK*, February 10, 1992, p.18.

② 《邓小平同上海各界人士共度佳节》，《参考消息》1992年2月5日，第1版。

③ Chua - eoan. Howard, Walsh. James, "The Last Emperor", *TIME*, March 3, 1997, p.38.

④ Schell. Orville, "Deng's Revolution", *NEWSWEEK*, March 3, 1997, p.17.

⑤ Mcgerary. Johanna, "The Next China", *TIME*, March 3, 1997, p.24.

⑥ Jr. Frank Gibney, "Brandishing the C Word", *NEWSWEEK*, March 9, 1992, p.12.

⑦ Jr. Frank Gibney, "Deng's Revival", *NEWSWEEK*, April 27, 1992, p.14.

⑧ Jr. Frank Gibney, "Deng's Revival", *NEWSWEEK*, April 27, 1992, p.10.

文章试图重新启动改革,但是他的干预并没有明显的效果。他们认为,邓小平试图通过这次南方视察,利用其个人在党内和人民中的威望,冲破阻力,为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注入推动力^①。有文章提出,87岁的邓小平能否回击反对他的强硬分子并带领中国走出意识形态的樊篱,是对这位20世纪重要政治幸存者才能的考验^②。邓小平南方视察是试图“通过迂回包抄老保守派的办法使这个国家直截了当地回到改革的道路上”^③。

此外,国外有的文章还分析了南方视察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在其政治生涯中的作用。约瑟夫·菲斯米斯特(Joseph Fewsmist)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视察批评了“左派”,中共十四大支持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标志着邓小平政治生涯顶峰的到来和“邓主义”时代的开始^④。有人甚至认为,南方视察使“邓小平思想”成了福音书^⑤。

三、研究南方谈话的角度

从西方舆论对邓小平南方视察的反响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分析这一事件的一些独特的角度。

首先,有的作者把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与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南方视察进行比较。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视察与毛泽东的那次南方视察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国际、国内形势都在经历一些较大变化,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有分歧,两个人都在考虑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并且都试图运用他们个人的魅力施加影响等等。

其次,有的学者从邓小平的权力基础和领导方式的角度,把邓小平南方视察当作一个政治现象进行了研究。沈大伟认为,邓小平的权力是建立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面的,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是一个组织者,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通过一个官僚架构来行使权力的。然而,在邓小平的晚年,他的这一领导方式却遭受了挫折,他遇到了难以改变的既得官僚利益和按自己的议程表行事的接班人,无法通过正常的官僚渠道推动改革。于是他选择了南方视察,通过自下而上的压力和重新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取得政治主动权。这种举措是毛泽东在类似情况下经常采取的。沈大伟还认为,对政治家来说,有很多通往权力的钥匙——掌握国家的重大问题的议程表是(权力的)另一来源。要做到这一点,政治家们首先要有自己的议程表,邓小平当然也有一个。他认为,当邓小平意识到议程表被别人控制或不适当地干预的时候,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来取得主动权;90年

代初,邓小平不满于经济改革的速度和“左派”对政治的控制,就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和毛泽东在类似情况下一样,邓小平认为最有力的武器便是自己的威望,于是通过参观深圳和珠海特区这样的方式来重新获得对改革议程表的主动权。^⑥卢西恩·派伊(Lucian W. Pye)则认为:“邓小平的行为像一个传统的中国政治领袖”;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认为,权威存在于神秘之中;中国伟大的政治领导人一般都躲在权力的幕后,都被认为有着谦逊的举止和不为人知的优点;邓小平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变革年代的杰出领导人,他的领导风格却比近来中国其他领导人都要传统;他把电视带进中国,但是,他在自己控制宣传工具的年代却很少在电视上露面。派伊指出,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邓小平本来可以通过在电视上的公开攻击来挫败自己的对手,但他没有这样做。1992年1月,邓小平接受身边人的建议进行南方视察,并在电视上短暂露面,这一举动被电波传向全国,它表明中国的政治将再次转向,赞扬经济自由化和改革的文章随之多如潮涌。^⑦

第三,也有学者从群众动员的角度来看待南方视察。认为群众动员在中国政治的人事变动和政策创新的合法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80年代,群众动员与经济的相互影响成为可能;1992年,邓小平就运用了这一方式^⑧。

第四,还有学者从政治运行状态入手,解释邓小平南方视察。弗雷德里克·泰韦思(Frederick C. Teiwes)撰文认为,中国在毛泽东逝世后实现了向“正常政治”的转变。所谓“正常政治”,从根本上

① Shambaugh. David, "Deng Xiaoping: The Politician",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93, p.488.

② Jr. Frank Gibney, "Deng's Revival", *NEWSWEEK*, April 27, 1992, p10.

③ Walsh. James: Deng Makes Waves, *TIME*, February 10, 1992, p.18.

④ Fewsmist. Joseph: "Chinese Politics on the Eve of the 15th Party Congress", Kuan. Maurice Brosseau, Kueh. Hsin - Chi. Y. Y., *China Review* 1997,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

⑤ Chua - eoan. Howard, Walsh. James: "The Last Emperor", *TIME*, March 3, 1997, p.38.

⑥ Shambaugh. David, "Deng Xiaoping: The Politician",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93, pp.475 ~ 476.

⑦ Pye. Lucian W., "An Introductory Profile: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93, pp.414 ~ 415.

⑧ Dittmes. Lowell, "The Changing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January 2001, pp.64 ~ 65.

讲,就是处于制度化体制最高层的领导人,在受到各种问题与压力的困扰时,不会受到教条的意识形态的指引;领导人的角色是将各方不同的利益汇聚为较一致的方案以满足各层次支持者的需要,从而保证政策的执行或建立对个人或领导集体的支持;然而,“正常政治”往往会遇到一些无法预见的问题,这就需要临时的突破。邓小平是强势领导,虽然他能够很好地与这种政治运行状态保持一致,但他的确在聚集不同的利益、寻求非意识形态的结果并根据事态的发展采取不同的迂回策略;南方视察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南方视察中他绕过中央领导层,运用自己的能力和历史所赋予的优势引导体制朝着他所寻求的“正常”的方向前进^①。

必须指出,西方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评论,有许多片面甚至歪曲之处。最主要的是,普遍存在曲解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倾向,主观臆断这一讲话旨在转变中国的发展方向,向资本主义靠拢。这是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所决定的,并不奇怪。但他们

对南方谈话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把握,不能不说还是有一定的敏感性。事实上,他们正是从诸如解放思想、学习一切资本主义先进有用的东西、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市场等重大问题的把握上,意识到南方谈话将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大的变化。这样一种敏感性的认识,已经为邓小平南方视察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实践所证明。他们的一些分析角度也很难说不是一管之窥,甚至有很多夸张、扭曲之处,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更值得我们分析和思考。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062)

(责任编辑 王爱云)

① Teiwes, Frederick C., "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a Journal*, January 2001, pp.69 ~ 70.

(上接第79页)权宜之计。而那些民法、商法在军阀暴力政治下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法律、法规不是近代中国经济状况的真实、客观的反映,而大多是西方法律的“器官”移植,并且为军阀所摆布。李大钊明确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①中国近代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这种经济性质,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政治法律上的民主宪政要求,形成了中国法律走向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另一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所具有的对帝国主义经济的依赖性和广大农村仍然稳固而强大的自然经济基础,对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又具有强大的排斥和抵抗力,成为法制现代化的障碍因素。根据唯物史观,欲谋求中国社会的改造,欲进行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必须改变社会经济制度。因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②。

可惜,李大钊过早地牺牲了。他没有能够看到他所向往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没有能够看到法制现代化实现。今天,中国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奋勇迈进,“依法治国”早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并在实践中不断被推进,法制现代化终能实现,这足可告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英灵。

(本文作者 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大连 116029)

(责任编辑 薛承)

①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10页。

②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10页。